

从地理空间到创新共同体： 粤港澳大湾区枢纽型学者的跨界探索*

刘 绪^{1,2} 徐子茹³ 高 媛¹

(南方科技大学1.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2. 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 广东 深圳 518055;
3. 马里兰大学教育学院, 美国 马里兰州 20742)

[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与科技创新的重要国家战略。学界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研究多为宏观叙事或量化分析, 较少深入挖掘微观行动者的具体实践及多元情境下协同创新的复杂性。为此, 引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和罗纳德·伯特的社会网络理论, 将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从宏观制度分析下沉至微观主体的能动实践, 基于对35位粤港澳大湾区在政产学研跨界探索的高校枢纽型学者的深度访谈, 探讨其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与区域社会空间建构中的实践探索与挑战, 为理解“创新枢纽”的生成机制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研究发现, 协同创新不仅是资源整合的技术手段, 更是制度协调与认知重构的过程, 其中“枢纽型学者”是制度运行与跨境协作的关键节点。枢纽型学者以跨界机构为物理基点, 使知识的创造、传递与转化得以在同一实体空间实现, 并通过政策话语建构和地方性知识生产, 参与塑造区域认同与创新共同体; 同时, 他们通过灵活的实践政策解码、身份切换、非正式关系等策略, 发挥经纪人的作用, 推动资源整合。在此过程中, 枢纽型学者也面临政产学研逻辑冲突、制度异质性与身份认同困境等多重挑战。未来要推动构建跨组织、跨制度、跨文化的沟通机制与协同网络, 使协同创新成为区域空间重构与制度创新的深层支点。

[关键词]政产学研 协同创新 枢纽型学者 粤港澳大湾区 空间生产 创新枢纽

[中图分类号]F127; 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83X (2026) 05-0059-13

一、问题提出

高等教育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9年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 强化区域协同效应, 将粤港澳

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建设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2025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大湾区建设“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2]在“一国两制”制度背景下, 广东、香港和澳门先后发布多项政策并设立专门机构, 为跨地

收稿日期: 2026-06-29; 修回日期: 2026-08-12

*基金项目: 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开放性课题“年轻大学在城市文明变革中的角色与作用机制研究”(IGUC25C016); 2025-2026 年广东省海外名师项目“大湾区高等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研究”(MS202500136)

作者简介: 刘绪, 研究员,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政策和人才培养研究; 徐子茹(通讯作者),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和教育政策研究; 高媛, 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和教育国际化研究。

区、跨领域和跨组织合作创造了制度条件。

大湾区发展实践表明,湾区经济和科技发展离不开政产学研的深度协同^[3],它既是区域创新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支撑,也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升级和高校社会服务的重要机制。学界从创新人才培养^[4]、新质生产力^[5]、产业协同集聚^[6]等方面展开讨论,有助于认识湾区创新生态的整体结构,但较少考察微观行动者如何在不同制度、组织和专业边界间开展具体协作,未能充分揭示协同创新实践的动态性与复杂性。

当前,信息通信、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各国纷纷加大研发投入,强化创新体系建设,推动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7]⁹⁰我国明确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8],推动科技创新加快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大湾区开放程度高、经济活力强,也由此成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区域。^[9]在大湾区创新体系中,政府、产业和大学三大驱动要素间的交互协作关系会影响知识、人才、技术与资源的流动效率及创新活动的可持续性。^[10]创新系统能够促进政府、企业、大学和公共科研机构在不同专业逻辑基础上形成合作网络^[11]³⁵,各主体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同时相互嵌入,并承担彼此的部分功能,由此形成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创新生态系统。^[12]

国内对产学研协同的研究集中于两方面。一是从宏观层面对政府、产业与大学三者的功能定位、创新模式及协同机制,并基于组织社会学^[13]、资源拼凑理论^[14]、创新集群^[15]等解释产学研协同的作用机理,比较不同国家协同创新体系的发展特点^[16],同时指出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不健全^[17]、市场作用发挥不足^[18]、缺乏信息共享平台^[19]等现实障碍,及探寻多元协同模式及其演化路径^[20]。二是利用专利与论文产出数据等检验产学研协同的绩效与增长效应^[21-22],揭示其空间分布与时间演变特征^[23]。

围绕学术创业的探讨为理解这种微观层面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24]国外研究发现,高校教师在学术组织、产业和政府间扮演“学术企业家”“制度创新者”和“创新组织者”,并参与技术转移、政策建构和社会服务。^[25]⁵¹⁻⁶⁸他们凭借知识优势,通过跨界合作、网络搭建和资源整合,推动知识生产、技术转移与社会创新。^[26]但其跨界实践也面临学科背景与商业经验差异、学术活动与创业活动冲突及依赖科研网络而缺乏商业网络等挑战。^[27]跨界行动不仅取决于个人动机和资源,也受到大学制度、组织文化与区域创新生态的影响。研究他们的行动逻辑,能为理解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微观机制提供新的视角与启示。而国内学术创业研究仍主要关注学术创业者的角色冲突、企业创新机制和大学衍生企业绩效^[28],较少分析其与区域空间、制度结构及协同创新网络间的动态互动。大湾区具有制度差异显著、行政边界多重和创新资源高度集聚等特征,高校教师的跨界实践既能反映政产学研体系的运行机制,也集中体现了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制度张力。然而,现有大湾区高等教育的研究缺乏对个体层面能动性的微观深入探讨,特别是对于高校教师作为制度与区域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与行动者的关注不足,仍将大湾区简化为一个预设的战略谋划发展空间,忽视了其内在的建构性、实践的复杂性与个体经验维度。

基于此,本文聚焦具有跨界经历的大湾区高校教师,将其中能够连接学术界、产业界与政府,并在信息传递、资源配置和关系协调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行动者称为枢纽型学者。“枢纽”是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对网络运行与稳定具有重要影响。^[29]本文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考察枢纽型学者如何感知、构想并生活于大湾区这一环境空间。通过深度访谈,分析枢纽型学者如何穿梭于不同制度逻辑间,调动资源、建构关系、调适身份,建构大湾区的协同创新网络与社会空间秩序,并揭示他们在面对制度张力与结构不确定性时的行动策略与认知框架,丰富对大湾区政产学研协同发展机制与空

间生产复杂过程的认识,为理解区域创新生态的生成逻辑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阐释。

二、理论视角

本研究借鉴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的理论以及罗纳德·伯特的社会网络理论,理解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空间如何通过由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性空间构成的三元结构得以生产,并经由路径、网络和关系集群实体化。

列斐伏尔提出的概念框架中,空间生产的过程是空间实践/感知空间、空间表征/构想空间以及表征性空间/生活空间辩证互动的过程。对于空间三元辩证的前两个维度,列斐伏尔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统。他将“空间实践”理解为与空间相关的行为方式,即通过日常惯例和行动路径维持的实践,这同时也是身体对空间的体验过程。空间实践始终渗透着“空间表征”,后者是一个概念化的空间,即主要由政策制定者、学者、专家等构建的空间,体现着空间的意识形态维度。“表征性空间”则是由意象与符号传达的表意空间,它既补充空间实践又超越理性构想,正是空间的这一维度能规避主导性秩序与话语,彰显主体能动性,乃至实现另类空间构想。^{[30]58-59}

西蒙·马金森将列斐伏尔的三元模型进一步明确为物质域、想象域与实践域。物质域涵盖通信网络、政策法规、基础设施等既定结构,构成空间生产的物质性约束条件;想象域承载意识形态、社会想象与话语建构,驱动空间意义的符号化生产;实践域则包含高等教育中的教育、研究和服务等实践,包括与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三域之间动态循环、辩证互动,推动着高等教育空间的演变发展。^[31]

空间生产理论聚焦于宏观的生产过程和社会结构整体演变。因此,研究引入社会生产理论,补充对空间微观机制的理解,助力探究主体在网络结构中的行动策略与关系建构路径。该理论将空间视为一种结构,把空间中的

行动者节点及其关系结构化,强调不同节点即个体或群体间的“结构洞”带来的独特优势。结构洞理论由伯特提出,指的是某些行动者处于信息与资源流动的重要“桥梁”位置,他们能在网络间进行信息中介和资源整合,积累社会资本并获得较强的创新和行动力。连接更多“结构洞”的行动者,往往能掌控稀缺信息或桥接资源,在各种社会项目、生活空间及利益博弈中获得竞争优势。^{[32]148-190}

空间生产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共同指向空间的关系性。列斐伏尔对空间的批判性理解将其视为社会和政治建构的产物而非单纯的物理实体,空间是“一连串和一系列运转过程的结果”,不仅容纳被生产出来的物体,也包括事物间的相互关系。^{[30]xiv,64}换言之,“空间是生命体与社会物品的关系性安排”,并且“空间的构成只能是连接的结果”。^{[33]106,131}相似地,伯特将社会结构视为一个庞大复杂的关系网络,社会存在并非由孤立的个体属性定义,而是由个体间持续互动的关系模式建构。两种理论视角下,本研究将高校教师工作与生活所在的大湾区视为一个被持续建构的社会空间,一个由多元行动者的实践、制度结构、社会关系网络、空间表征等共同生产的动态场域,跨界高校教师的认知与行动深刻塑造着这一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

空间生产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为我们理解主体在应对地缘政治与宏观经济变革时,如何解读并参与构建社会行动网络、推动大湾区社会空间拓展提供了重要理论视角。然而,当前教育研究鲜有对网络、空间及空间性的深入探讨^[34],更未将这种理解应用于大湾区的相关议题探索中。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战略支持下的重要发展区域,其空间场域具备优越的政策条件与资源禀赋,更呈现出多制度交汇、多要素融合的独特格局,为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提供了丰富机遇。高校教师在推动这一协同空间中扮演了日益关键的“网络经纪人”角色,但当前教育研究

对这一群体在空间建构中所承担的微观角色、实践策略与认知过程认识不足。因此，将空间生产与社会网络理论运用于大湾区高等教育研究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意义，也将为推动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创新枢纽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引。

三、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于半结构化访谈，主要采用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结合的方式招募受访者。研究团队通过高校官网、新闻报道等渠道锁定在粤港澳大湾区内拥有政产学研跨界、跨界实践经历的高校教师，以电子邮件形式邀请其参与访谈，并在访谈结束时请其推荐其他符合条件的同仁，逐步扩展样本规模，确保研究对象的代表性与多样性。研究共访谈了35位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领域、具有跨界经历的教师（具体编码与信息见表1）。

这些受访高校教师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主要工作和生活空间，是大湾区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包括2名助理教授、7名副教授和26名教授，其中8人任院长或副院长，4人担任副校长。学科分布方面，理工背景的有19人，人文社科背景的有16人，涉及物理、机械工程、医学、经济学、教育学、公共政策等领域。从跨界类型看，11位教师同时跨政、产、学、研四界，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跨产、学、研进行合作，另有5人跨政、学、研。所涉及的跨界合作形式多样，包括创办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参与产业委员会，或通过智库、政府委员会或行业协会等渠道开展跨政界协作。访谈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展开，22位受访者选择在深圳、广州、香港和澳门等地面对面交流，其余13人通过线上会议完成，每次访谈时长约60分钟。值得注意的是，受访群体中男性占32人，仅3名女性学者参与，因而本研究在性别视角上仍有局限，同时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跨界高校教师群体以男性为主的现实状况。

表1 受访者编码及信息

编码	常住地	访谈方式	学科	性别	职称/职位	跨界类型	跨界合作形式
GD1	广东	线下	理工类	男	教授	产+学+研	联合实验室
GD2	广东	线下	理工类	男	副教授	产+学+研	创业
GD3	广东	线下	理工类	男	教授	产+学+研	联合项目
GD4	广东	线上	理工类	女	助理教授	产+学+研	联合项目
GD5	广东	线上	理工类	男	实践教授	政+产+学+研	创业孵化中心
GD6	广东	线下	人文社科类	男	教授、院长	政+学+研	政府智库
GD7	广东	线下	理工类	男	实践教授	政+产+学+研	产业委员会、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政府委员会在政府、企业、高校长期任职
GD8	广东	线下	人文社科类	男	实践教授	政+产+学+研	创业
GD9	广东	线下	理工类	男	讲席教授	产+学+研	政府智库
GD10	广东	线上	人文社科类	男	教授、院长	政+学+研	政府智库
GD11	广东	线上	人文社科类	男	教授	政+学+研	政府智库
GD12	广东	线上	人文社科类	女	教授、副院长	政+产+学+研	政府顾问、企业顾问
GD13	广东	线上	人文社科类	男	教授	产+学+研	企业培训
GD14	广东	线上	人文社科类	男	教授	政+产+学+研	政府顾问、企业培训
GD15	广东	线下	理工类	男	副教授	政+学	咨询
GD16	广东	线下	理工类	女	副教授	政+学	咨询
MC1	澳门	线下	理工类	男	教授、副院长	政+产+学+研	联合实验室
MC2	澳门	线下	理工类	男	教授	产+学+研	联合项目
MC3	澳门	线下	理工类	男	副教授、院长	政+产+学+研	行业协会、政府委员会、社团
MC4	澳门	线下	理工类	男	助理教授	产+学+研	联合实验室
MC5	澳门	线下	理工类	男	教授	政+产+学+研	创业，政府委员会
MC6	澳门	线下	理工类	男	副教授	产+学+研	联合项目
MC7	澳门	线下	理工类	男	教授、副校长	政+学+研	政府委员会
MC8	澳门	线下	理工类	男	副教授	产+学+研	联合项目、联合实验室
MC9	澳门	线上	人文社科类	男	教授	政+学+研	政府智库
MC10	澳门	线上	人文社科类	男	副教授	政+产+学+研	社团，企业合作
MC11	澳门	线下	人文社科类	男	教授、院长	政+产+学+研	政府委员会，企业合作
HK1	香港	线下	理工类	男	教授、副院长	产+学+研	医院
HK2	香港	线上	理工类	男	教授、副校长	政+产+学+研	联合项目，联合实验室，政府委员会
HK3	香港	线下	人文社科类	男	教授、副院长	政+学+研	政府委员会
HK4	香港	线下	人文社科类	男	教授、副院长	政+学+研	政府委员会
HK5	香港	线下	人文社科类	男	教授、院长	政+学	咨询
HK6	香港	线上	人文社科类	男	教授	政+学	咨询
HK7	香港	线上	人文社科类	男	教授	政+学	咨询
HK8	香港	线上	人文社科类	男	教授	政+学	咨询

注：编码方式为“常住地+序号”，其中GD为广东（Guangdong）缩写，MC为澳门（Macau）缩写，HK为香港（Hong Kong）缩写。

四、枢纽型学者的协同创新空间建构

（一）跨界机构是协同创新的载体与中介

大湾区是由我国南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个内地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

特别行政区共同构成的空间。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大湾区不仅承载着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开放型经济的重要使命,也是探索协同创新的关键试验场。大湾区的形成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深刻依托于历史形成的社会网络、经济往来与空间实践,并在持续的政策支持、资源流动与制度整合中逐步构建而成。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生产一种社会空间,在其中社会能够通过自我表征和自我再表征而取得一种形式,不是一件能瞬间完成的事情。”^{[30]52}早在大湾区建设发展战略正式提出前,港澳高校已在广东多地设立了若干附属机构,例如香港城市大学深圳研究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如表2)。这些机构多由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高校及其基金会出资兴建,旨在发挥向内地延伸的桥梁作用。它们被视为具有官方联络属性的合作平台,为港澳高校进入内地开展科研合作与创业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背书。

表2 粤港澳大湾区部分跨境与跨界合作机构

获批时间	机构名称	参与单位	所在地区
2005年	香港城市大学深圳研究院	香港城市大学	深圳
2007年	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	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
2010年	香港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	香港理工大学	深圳
2012年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香港大学	深圳
2019年	粤港澳光热电源材料与器材联合实验室	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市瑞丰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澳门大学等	深圳
2020年	粤港澳中医药与免疫疾病研究联合实验室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澳门科技大学、广州悦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等	广州
2020年	粤澳先进智能计算联合实验室	广东琴智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澳门大学、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大横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珠海
2022年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
2023年	粤港有序结构材料的制备与应用联合实验室	汕头大学、香港大学、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等	汕头
2023年	粤港澳碳中和科学与技术联合实验室	江门双碳实验室、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香港科技大学等	江门

资料来源:各机构官方网站。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跨境、跨界的办学与科研合作呈现出阶段性扩张的趋势,机构的数量与规模均显著增长。^[35]其中许多新兴组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名获政府审批,不断被纳入大湾区战略的整体叙事体系中,进一步强化其合法性身份与功能定

位,成为推动协同创新的重要支点。如表2所示,2019年来,一系列粤港澳跨界机构陆续获批建设。这类组织运营模式灵活,强调以需求为导向的研发与成果转化。许多新兴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采取了“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或“高校-企业-政府”模式,通过制度化的跨界平台吸引了不同性质的参与者加入,整合不同类型组织的知识与资源,使创新活动能够在学术研究与产业应用间实现双向流动。一位广东学者称其所负责的联合实验室为“闭环生态系统”(GD1),依靠学科领域的内生关联,这一实体机构将智能医学研究、医院与医疗企业结合起来,形成从临床问题识别到实验探索、技术开发、试验验证再到商业化落地的路径。在应用物理与材料工程领域的另一位受访者案例中,联合实验室通过基金申请获得支持,引入东莞地方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资助,实现高校、企业与政府的三方协同(GD7)。作为载体,跨界机构承担着中介性集合功能。这些实体组织通过对场地、实验设备、科研基础设施的集聚与配置,把分散在不同城市的科研力量、产业需求与政策要素物理性地汇聚在同一空间结构,将抽象的跨界合作转化为可感知、可使用的物质形态,成为协同创新的基础设施。

这些机构还在区域资源互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受访者普遍认为,粤港澳合作机构有效缓解了港澳高校因本地产业规模有限、市场需求对接不足和物理空间制约面临的发展瓶颈,契合广东希望通过深化产学研融合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内在诉求(MC2, MC3, HK2, GD5)。一位任职于澳门大学的受访者提到,澳门“产业体系相对单一”“需求量低”,与其合作建立联合实验室的广东企业则可提供实验平台、数据和技术支持,推动研究成果直接落地(MC4)。粤港澳三地的制度差异使单一组织难以独立承载来自三地的复杂创新任务,跨界机构则在区域内形成了一种“互补性嵌入”的结构,通过各自的优势互补与网络化合作,弥补单一区域的结构性不足。它们共同为区域创新网

络提供了物质锚点,在多点布局与互联互通中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创新格局。

跨界机构作为协同创新的载体与中介,为高校教师构建大湾区社会空间提供了重要支撑。不同于传统的大学实验室或纯商业公司,跨界机构是融合了学术科研、技术开发、产业应用乃至资本对接等多种功能的混合型空间。这些具体的、实体性的场所将区域内分散的学术、产业与政策要素嵌入到空间布局,为教师提供了与多元主体具身化互动的平台,使知识的创造、传递与转化在同一实体空间进行,极大促进了理论与实践在空间层面的融合。这种物质层面的空间实践重塑,使高校教师突破区域、行业、制度等壁垒,嵌入并最终构建起一个以协同发展为核心、跨越粤港澳三地的创新共同体的物理基础。更重要的是,跨界机构的涌现并非仅仅改变大湾区的物理空间,它们还推动着协作制度框架的构建,使行动主体的多重空间实践成为可能。

(二) 构建创新共同体的“被想象空间”

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空间的生产不仅依托于物质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深刻体现于话语塑造、符号赋予与社会实践之间持续而深刻的互动过程。空间并非中性的容器,而是被表征与再表征的社会建构,是经由话语阐释和社会实践被赋予意义的文化产物。^[30]¹³⁸⁻¹³⁹作为大湾区空间的“积极使用者”,高校教师尤其是跨学术、产业与政府界的枢纽型学者,在知识创造上扮演重要角色,并通过话语的生产与传播塑造着区域的空间意义与象征秩序。这一过程中,学者不仅参与区域创新生态和高教协同的政策话语建构,还将“创新”“协同”“开放”和“共同体”等概念转化为具有制度效力与文化象征的关键词,构筑起大湾区的符号化空间,强化区域联合身份和文化认同,推动大湾区从行政地理名词向社会认同共同体建构。

在大湾区的空间生产与创新协同过程中,关键节点学者的作用往往超越了单纯的学术研究者身份。他们常以多重角色进入制度运作的

核心场域,例如受邀担任政府委员会成员、行业协会与民间组织的顾问,甚至以政协委员、立法会议员等身份直接介入公共决策,深度参与大湾区空间治理与政策话语的塑造。一位来自香港的学者称这种参与是“为高等教育捧场”。在他看来,香港学术界与政府间的网络连通“很薄弱”,而立法会成员的角色使他能参与推动国际教育枢纽建设等议题的提出与落实(HK3)。政协是另一条重要的制度参与渠道。一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受访者曾参与大湾区科技创新的专题调研,通过提案与调研报告为政府部门提供系统化的政策建议,其“将个人经验转化为政策话语”,推动具体实践问题进入政治议程,使政策更加契合区域发展的实际需求与跨界协同的复杂性(GD7)。

在高等教育机构被期望承担起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第三使命”的背景下^[36],大学成为政府的“思想库”与“智囊团”,高校学者也正越来越多承接社会发展乃至国家战略需求,成为政策制定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37]一名来自广东的学者认为,大学正在从“象牙塔式的研究”到“政策导向的智库式研究”转型,这在大湾区高校尤为明显(GD11)。在《纲要》发布之初,他的团队便参与了政府部门委托的高等教育合作方案制定,前往大湾区各城市的企业、高校调研,推进形成新的框架性协议和具体实施方案。实际上,在大湾区教育、科技与人才等战略性领域,枢纽型学者常常是框架设计与文本起草的主笔者,他们提出的概念、指标和方案在政策文件中得以呈现,进而对区域发展的方向产生深远影响。他们不仅“解释”空间,也在“塑造”空间。

这些政策报告和框架本身便构成了一种“被想象空间”,换言之,语言和话语使“共同体”得以被“想象”。^[38]诸如“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优质生活圈”等概念,首先通过政策文本被官方定义。它们为一片地理区域赋予了一个统一的、带有特定目标和价值取向的身份,将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转化

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经济项目。大湾区空间的建构与自然生发,离不开高校学者在学术论坛、媒体专访、公众演讲等场合的演说和传播。“创新共同体”“世界级湾区”等语词不仅传递信息,更在激发情感、构建共识和动员行动。连通政治与学术网络的枢纽型学者进一步经由研究报告、理论文章、政策分析等制造出“协同创新”“跨境融合”“制度互补”等学术化、概念化的语言,为理解大湾区提供认知框架;同时,他们还将杂乱无章的现实问题归类、抽象为“制度性壁垒”“要素流动梗阻”等可被识别、分析和处理的政策议题,引导着社会资源的流向。正因此,空间表象并不只是抽象的观念,而是“有其实际的影响力”,并通过实践的影响而具有客观性。^{[30]64}

不过,不同地区的学者因其身处不同的制度环境、学术传统和利益结构,形成了差异化的大湾区话语。内地学者更倾向于采用国家战略与发展主义的话语框架,强调大湾区的“引擎”功能、“融合”的必要性及“世界级”目标,其论述常与“民族复兴”“国家现代化”等宏大叙事紧密挂钩。港澳学者在认同国家战略的同时,更聚焦“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与挑战,担心“融合”可能带来的利益稀释。换言之,尽管学者都在国家政策的法律与符号框架内言说,共享由国家战略提供的宏观话语框架,但高校教师往往会运用差异化的建构逻辑和话语符号争取空间的意义界定权,服务于不同的地域发展诉求。因此,政策话语建构与创新共同体的持续深刻互动并非单一、线性和同质化的过程,而是充满了持续的协商与深刻的内在张力。

五、枢纽型学者的能动实践与身份困境

(一)“网络经纪”实践和策略

在粤港澳大湾区从地理空间发展为创新共同体的过程中,高校教师特别是那些活跃于学术、产业与政府交叉地带的枢纽型学者,扮演

着远超传统知识生产者的关键角色。通过物质实体的建构与话语符号的生产,他们深刻参与了大湾区物理空间与象征秩序的塑造。实践过程中,枢纽型学者采取了一系列行动策略,积极跨越机构与城市边界,有效调动包括思想、知识、资源、规则乃至权力在内的各类要素。作为填补结构洞的“网络经纪人”,他们的实践为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开辟了关键空间。

“网络经纪”(network brokerage)是网络中一位行动者占据两个或多个原本互不相连的行动者之间结构性位置(如结构洞)的一种活动,通常涉及经纪人或中间人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互动。^[39]而凭借跨界身份与经验,高校学者往往能敏锐发现并填补学术、产业与政府三者之间的结构洞,使自身成为推动知识与资源互联互通的桥梁。正如一位澳门学者提到的,高校学者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他们“与产业界有很多接触,在一线与公司洽谈,通过社团联合群体,有机会向政府汇报诉求,向民众传达想法”(MC3)。跨界学者作为一线问题的收集者与转译者,将产业的实践经验带入学术讨论,将学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又作为制度化通道的使用者与建构者,将现场经验上升为政策议题,影响决策议程与资源配置,同时还在实验室建设、产学研合作项目与人才培养环节中,将政府战略性需求具象化为可操作的目标与组织方案。

这一过程中,枢纽型学者发挥的作用不仅是传递信息,更重要的是“解码”、配置与整合信息与资源。行动者能够接触到多样的信息,但他们获得的信息往往难以解读和吸收。^[40]于是,枢纽型学者通过对不同行动者需求的再表述,使原本分散的政策目标、产业利益与学术议题能在共同语境下被重新组织。这种“翻译”是对战略意图与潜在机会的解码与再编码,使其能为不同的群体理解接受。例如,在与同行及合作伙伴的互动中,高校学者往往会将大湾区“创新驱动”“产学研融合”等宏观叙事拆解为更具体的行动框架:对学术团队,他们会强调政策红利与项目资金的获取路径,从而帮助

研究人员快速识别对口机会；而面对产业伙伴，他们则重点阐释“哪些研究成果更易于实现转化，哪种合作模式更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MC2），从而降低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合作风险与成本。

学术型企业家尤其在资源整合方面展现出了高度的策略性与灵活性。GD2是一位在深圳创业多年的高校教师，在他看来，通过将企业需求与高校资源对接，学术型企业家可以显著降低研发成本，实现生产要素的灵活调度。这种“资源互补”不仅节省了企业资金投入，也反过来提升了高校资源的使用效率，产业数据与成果还会反哺学术研究，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此外，学术企业家往往能凭借双重身份申请多渠道的资金支持。于是，通过同时整合高校资源、企业优势与政府专项基金，枢纽型学者构建了一个复合型网络，推动政产学研三方良性互动。这种跨界资源整合同时也是一种资本转化。正如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可以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相互转化^{[41]202}，这一跨界资本流动机制促使学术企业家成为多重场域的桥梁和枢纽。他们在学术、产业和政策场域之间穿梭，积累和转化各类资本，也通过建立合作网络、优化资源组合和对接政策需求，塑造大湾区跨界创新的社会空间。

在这些复杂的“穿梭”中，高校教师不仅依赖正式的制度渠道和政策支持，非正式关系网络也是重要的行动策略。正式层面，学者们通过注册企业、申请政府专项基金、参与国家和地方科研项目等，实现对财政补贴、实验设施、人才计划等制度化资源的合法获取和调配。非正式层面，他们通过个人声誉、学术声望以及长期建立的同行、校友和产业合作关系，获取第一手信息、形成合作默契，并在必要时通过沟通、社交活动等推动项目落地。多位受访者表示，许多项目需要较长时间建立合作关系，并伴随着较多非正式沟通与社交活动（HK2，MC5）。因此，他们倾向于在既有制度框架内探索更具灵活性的合作路径（GD8）。正式与非正式机制的交织，使枢纽型学者能将政策、资金

与人才资源整合成一个跨地域、跨层级的多维度网络，这也增强了协同创新体系的弹性与韧性，推动大湾区制度空间的不断完善。

总的来说，这些行动策略既有对上对下的政治与制度斡旋，也有横向跨界的网络经纪与资源配置；既强调对政策与文化话语的翻译与解码，也重视对具体资源要素的灵活运用。跨界学者凭借这些复合式、动态化的行动策略，推动大湾区创新共同体的不断生产与再生产。也正是这种跨界流动和多层面介入，使枢纽型学者成为大湾区协同创新网络中不可或缺的资源整合者与制度协调者。这些学者往往在学术研究者、企业家、政府顾问、公共知识分子等多重角色间灵活切换，以获取更广泛的资源与影响。于是，在构建空间治理秩序中，他们可以利用其跨界经验和专业地位，协调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关系，乃至缓解制度与文化差异带来的摩擦，促进粤港澳三地在治理模式、法规政策上的互认与对接，以及大湾区治理框架的动态调整，推动大湾区创新网络的稳定运行和持续发展。

（二）政产学研逻辑冲突与身份困境

在驱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与空间生产中，枢纽型学者扮演了越发重要的关键角色。他们致力于跨越学科与部门边界，通过资源整合与网络构建推动知识转移，并在区域创新系统中发挥纽带作用。但与此同时，高校教师们的跨界实践也面临诸多挑战。

高校教师面临的首要挑战在于政治、学术与产业三种逻辑之间的张力。政府运作讲求行政效率、政策响应与上级指令的执行，但往往伴随程序繁复、审批周期长、决策层面意见不一致及决策过程不透明等问题，其过程常出现不可预测的变动。而学术研究活动一般基于公开论证与可验证性，评价标准相对客观、稳定，也更强调规范性、一致性与透明性。一位受访学者深切体会到这种张力，他表示政府合作项目通常具有时间要求紧、审批流程较复杂等特点，需要多个部门协调推进（GD11）。他认为，这种组织运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合作成本，并可能

影响项目推进效率。并且,在跨界合作中,学者并不是与政府并肩的对等主体,更多是被纳入政治逻辑设定的轨道中,他们的专业知识在很大程度上被动服务于行政目标。就像另一位广东学者也提到,不同组织对于合作目标和工作重点存在不同理解,行政部门和高校强调“不同的道理”(GD10)。这种权力结构使学者在协商中常处于被动,必须不断调适自己的工作计划与预期,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者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

如何调适产业逻辑与学术逻辑也是跨界学者需面对的课题。产业界追求短期盈利能力、市场占有率与技术应用的即时有效性。与之相对,学术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长期的知识探索与理论突破。许多学者都有相似的感受:

“业界希望能够扩展业务,推广产品和技术,获得经济利润。而我们更多是希望能找到核心与前沿问题……研究可能5-10年才真正可以商业应用。”(MC6)还有受访学者坦言:“如果企业要求两三年就出成果,那基本不可能做高水平的研究。”(MC7)这种目标诉求的分歧、“期待感的错位”使二者的合作并非总能达成一致,需要“持续的、有时是艰难的沟通和协调”来跨越“鸿沟”、寻找“有限的共同基础”(MC4)。因此,跨界合作的枢纽型学者在政策推动、科研计划与商业合作中不得不进行不断妥协与策略调整,以平衡短期与长期、实用性与探索性的矛盾,承担“意义调和者”的角色。但这种对政产学研逻辑的调适也意味着学者的行动空间始终充满张力,他们不得不在制度逻辑的碰撞中承受额外负担与不确定性,甚至面临学术自主性受限与研究方向被“外部逻辑”牵引的风险。

此外,三地不同的制度环境增加了学者跨界实践的复杂性。粤港澳三地在政策规定、资金使用、知识产权、合作审批流程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学者在跨城市、跨制度、跨境的实践中需不断调整策略、操作变通,产生了极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尽管部分学者会通过精准识别并利用各地政策红利,实现人才、资金与技术等资

源的优化配置,但他们的行动依然深刻受制于结构性的制度与文化区隔。正如一位香港学者所言,与内地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通常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沟通交流和关系建立过程,因为“必须花很长时间建立互信”(HK2)。一位澳门学者也提到,由于部分港澳学者对内地制度机制和组织运行方式缺乏充分了解,其前期投入有时难以顺利转化为实际合作成果(MC2)。即便在政策利好的背景下,一位负责学校科创工作的广东学者也表示,实践层面的人才、数据与资金等关键创新要素的跨境流动“都很难实现”(GD5)。可以看出,枢纽型学者被迫将其时间与精力投入应对制度复杂性、构建人际信任、解释规则差异等方面,给大湾区创新要素的高效流动与深度融合带来了消极影响。

政产学研逻辑的张力进一步造成跨界学者的身份认同困境,构成其跨界实践中的深层挑战。由于政治、产业与学术场域各自秉持自身的合法性基础、价值导向与行为规范^[42],学者作为穿梭于这些场域间的“游牧者”,不得不持续进行角色切换与自我重构。在学术语境中,他们是追求知识创新与理论突破的研究者,需维护科学严谨性,获得同行认可;在产业语境中,他们需扮演精通技术应用与市场逻辑的顾问或负责人,强调效率、盈利与可行性;与政府互动时则常需转换为谙熟政策话语、善于把握宏观战略的智库专家。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想象处于一种持续的“生成状态”。^{[43]195-214}许多研究表明,目标角色未确定可能会导致个体出现不安全感与孤立感,在身份认同调适的过程中,跨界学者会经历不确定性与焦虑等消极情绪,甚至中断其中一种角色。^[44]一位广东学者便坦言自己在“政策专家”与“纯粹学者”身份间的内在挣扎:“有时候也会纠结应该怎么办……可能自己内心真正感兴趣的还是更学术的东西。”(GD11)亦有学者在尝试创业后,因为难以“跳出学者思维”“放下科学家包袱”(GD5),适应市场规则与商业逻辑,选择放弃这一条道路。这不仅反映出个体在身份整合过程中的适应性困境,也折

射出系统层面未能为跨界者提供足够制度性包容与角色转换支持的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学科领域的跨界实践具有不同的实践逻辑,这也导致学者面临不同的机遇与挑战。理工类学者往往需要在学术自主性与市场需求之间寻求平衡,在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科学规范与商业利益之间不断进行身份协调,同时更多面临关键资源要素的流动问题;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则需要处理政治逻辑与学术逻辑之间的张力,以及调适粤港澳在学术系统、话语范式等方面的差异。不过,跨界高校教师所面临的困境也具有共通性。他们在大湾区跨界实践中,需要应对政治、学术与产业逻辑的张力,协调制度差异带来的操作成本,并处理多重身份的认同冲突。通过策略性调整、文化调适与制度解释,他们能在有限的行动空间中推动政产学研协同,维持跨城市、多制度环境下创新网络的活力与延展性。但“网络经纪人”“意义调和者”等角色功能的发挥不仅取决于其个人能力与策略,更依赖于顶层设计提供更具包容性与弹性的制度安排,以降低跨界合作的制度成本,并真正尊重与调和政产学研、粤港澳三地之间的差异。

六、结论与讨论

在全球知识与科技革命加速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区域创新能力不仅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动力,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区域发展的组织方式与资源配置逻辑。这一转型过程中,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作为跨组织、跨领域的协作机制,它通过整合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多元资源、知识体系与实践经验,构建了一个协同互动、共生共创的生态系统。不过,协同创新并非仅源于宏观的政策规划或制度设计,有赖于建构“有组织创新”体系以推进科技创新跨境合作^[45],而是根本性地生成于枢纽型学者扎根实践的策略性行动与网络化互动中。这些学者通过日常化的资源协调、

制度斡旋与跨界合作,将抽象的区域化发展战略转化为具体的创新实践,在多元制度交织的复杂环境中持续建构,推动大湾区从地理空间发展为具有政治、经济、文化意义的创新共同体。本文表明,创新共同体的生成依赖于行动者的日常实践;跨界高校教师并非被动适应空间秩序,而是以其具有反思性的实践策略积极参与了大湾区创新共同体的建构。他们既嵌入于制度结构中,又凭借其独特的跨界资本与能动性,诠释、调整并重塑着区域的空间关系与创新治理格局。

首先,在物质域方面,跨界机构通过整合分散的学术、产业与政策要素,形成了可供利用的场所与设施。这些场所压缩了知识、技术和资本之间的距离,使合作不再停留于文件与口号,而是转化为可触摸、可进入、可持续的空间安排。其次,在被构想空间维度上,枢纽型学者通过深度参与政策研讨、规划起草与智库咨询,成为大湾区“符号化空间”的关键建构者。他们将“创新”“协同”“湾区共同体”等宏观战略话语转化为可操作的地方性知识与制度文本,有效影响了区域发展的政策议程与群体的认知框架。再者,在表征空间层面,枢纽型学者通过政策解码、资源整合、关系协调等具身化的跨界实践积累经验并再生产着大湾区的社会空间秩序。他们在学术研究者、企业顾问与政策专家等多重身份之间灵活切换,利用正式渠道与非正式关系,积极扮演“网络经纪人”角色,持续吸引新节点加入,显著增强了现有网络的广度与密度,推动创新共同体的实质性生成。

然而,枢纽型学者在跨界实践中常会遭遇深层的矛盾与阻力。这些挑战包括政治、产业与学术逻辑之间的张力,粤港澳三地制度异质性导致的要素流通受阻,以及跨界者的身份认同困境。可以看出,在大湾区这一多制度、多文化的复杂区域中,协同创新不仅是一种资源整合的技术手段,更是一种制度协调与认知重构的过程。它对体制机制、认知方式、组织文化乃至个体角色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构建起跨

组织、跨制度、跨文化的沟通机制与信任关系。勒夫曾在《空间社会学》中提出,空间建构以空间的安排和空间的合成两种过程为基础,后者正是行动者在认知中通过语义、意义系统构建空间概念的过程,而只有经过这种文化、意义的合成与建构,空间才真正生成。^{[33][35]}在空间建构过程中,作为“网络经纪人”与“意义调和者”的跨界学者既要在多重逻辑之间实现资源的空间化配置,又要通过话语建构、政策叙事与实践网络不断“合成”意义,共同构筑对大湾区协同创新的认同与愿景。也就是说,跨界高校教师不仅是重要的网络枢纽,还发挥着“文化经纪”的作用;其不仅穿行于不同社会部门的边界,还处于“文化洞”的关键位置,跨越了不同文化共同体的边界。^[46]通过将信息解码并转化为易于理解的意义框架,他们有效弥合了不同群体间的认知差异。^[47]由此,枢纽型学者推动了知识、资源与文化的流动与整合。他们的中介作用不仅缓解了制度与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还增强了多元行动者间的互信理解,这进一步促进了区域一体化可持续健康发展。

因此,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从来不是简单的线性合作,而是一种嵌入式、系统化的网络协同过程。这一过程要求各方在战略目标、行动逻辑与利益诉求之间实现协同,推动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从政策导向到产业实践之间的有效转化。政府作为制度设计者和资源调配者,需要为协同创新提供制度空间与治理框架,营造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高校和科研机构则承担知识生产与技术突破的关键任务,是创新链的源头;而企业作为市场导向的主体,其对实际需求的敏锐感知和资源动员能力,使得技术得以落地与产业化。三者之间协同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区域创新体系的活力与可持续性。此外,大湾区协同创新共同体也对各方提出了超越本位主义、追求共识与协同增效的能力要求。面对“一国两制三法域”带来的制度异质性,协同创新的实践也应逐步承担起政策试验、制度磨合与空间对接的功能。

由此,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协同机制不再只是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学术配合的单向关系,而逐步演变为一个由多方共同建构、共担责任、共享成果的动态系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已成为引领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枢纽与实践抓手,它不仅重构了区域发展的知识逻辑、组织逻辑与制度逻辑,也为我国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枢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理论模式与制度经验。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完善协同机制、健全跨界沟通平台、激发各方参与积极性、打造具有活力的创新共同体,将成为推动区域空间生产与制度变革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EB/OL]. (2019-02-18)[2025-03-25]. 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2/18/content_5366593.htm#1.
- [2]深化粤港澳合作 建设一流湾区[EB/OL]. (2025-12-01)[2026-02-27]. <https://www.qstheory.cn/20251201/8c6dae6f03cc4c15827e5a0085c9adff/c.html>.
- [3]刘晖,肖喜明. 粤港澳大湾区大学协同创新能力评价:基于四大湾区的比较研究[J]. 教育发展研究, 2024, 44(1): 67-76.
- [4]陆春萍,张秀梅.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协同发展路径—基于区域创新体系视角[J]. 中国电化教育, 2023(3): 77-82, 89.
- [5]彭玲冰,尹华勤. 粤港澳大湾区新质生产力与产学研发展水平协同促进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26, 46(5): 249-258.
- [6]钟韵,秦嫣然.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5): 34-45.
- [7]Chen Q.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academic mobility[M]. Singapore: Springer, 2017.
- [8]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22-10-25)[2025-09-05].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9]Xie A, Postiglione G A, Huang Q. The Greater Bay Area (GBA)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ts relevance to higher education[J]. ECNU Review of Education, 2021, 4(1): 210-221.

- [10]Schneckenberg D. Open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networking in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 2015, 36(1): 14-24.
- [11]Lundvall B Å. The learning economy and the economics of hope[M]. London: Anthem Press, 2016.
- [12]Etzkowitz H, Leydesdore L. The Triple Helix-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 A laboratory for knowledge based economic development[J]. *EASST Review*, 1995, 14(1): 14-19.
- [13]张宏莹, 成欣欣. 产学研深度融合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基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J]. *生产力研究*, 2025(1): 29-34.
- [14]常悦, 李北伟, 李桃. 数字时代下欠发达地区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研究——基于资源拼凑理论视角[J]. *经济纵横*, 2023(9): 103-110.
- [15]王志强, 李菲.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范式转型与形成路径: 创新集群的视角[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44(3): 159-168.
- [16]Cai Y, Liu C. The roles of universities in fostering knowledge-intensive clusters in Chines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J].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015, 42(1): 15-29.
- [17]胡湘永, 廖文和.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产学研深度融合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与协同机制[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8): 142-149.
- [18]王涛. 三螺旋理论视角下的产学研政策分析[J]. *教育学术月刊*, 2018(5): 46-53.
- [19]余晓芳, 刘耀东.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究[J]. *理论月刊*, 2019(12): 155-160.
- [20]哈巍, 林璐. 我国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三螺旋模式及其多重演化路径[J]. *高等教育研究*, 2023, 44(4): 1-16.
- [21]Li J, Xing J. Why is collaborative agglomeration of innovation so important for improving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 perspective based on collaborative agglomera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ion[J]. *Complexity*, 2020, 2020(1): 7049606.
- [22]余荔, 贺洋. 产学合作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科研生产力的影响[J]. *高教探索*, 2026(3): 5-15.
- [23]Zhuang T, Zhao S, Zheng M, et al. Triple helix relationship research on China's regional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ased on provincial patent data[J]. *Growth and Change*, 2021, 52(3): 1361-1386.
- [24]Cunningham J A, Menter M. Micro level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A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2020, 39(5): 581-598.
- [25]Etzkowitz H, Ranga M. "Spaces": A triple helix governance strategy for regional innovation[M]//Rickne A, Laestadius S, Etzkowitz H. *Innovation governance in an open econom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26]Audretsch D B. Sustaining innovation and growth: Public policy support for entrepreneurship[J].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004, 11(3): 167-191.
- [27]Urbano D, Guerrero M.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in a European region[J].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2013, 27(1): 40-55.
- [28]周炜, 蔺楠, 张茜. 学术创业: 研究综述与展望[J]. *科研管理*, 2022, 43(1): 14-21.
- [29]Qiu F, Yu C, Feng Y, et al. Key node identification for a network topology using hierarchical comprehensive importance coefficients[J]. *Scientific Reports*, 2024, 14(1): 12039.
- [30]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31]Marginson S. Space and scale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glonacal agency heuristic revisited[J]. *Higher Education*, 2022, 84(6): 1365-1395.
- [32]Burt R S. The social capital of structural holes[A]//Guillén M F, Collins R, England P, et al.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Developments in an emerging field*.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2.
- [33]Low M. The sociology of space: Materiality, social structures, and action[M]. New York: Springer, 2016.
- [34]Danaher P A, Danaher G, Moriarty B. Space invaders and pedagogical innovators: Regional educational understandings from Australian occupational Travellers[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Rural Education*, 2003, 18(3): 164-169.
- [35]李家新, 谢爱磊, 范冬清. 区域化发展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 基础、困境与展望[J]. *复旦教育论坛*, 2020, 18(1): 84-90.
- [36]Etzkowitz H, Webster A, Gebhardt C, et al.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 of the future: Evolution of ivory tower to entrepreneurial paradigm[J]. *Research Policy*, 2000, 29(2): 313-330.
- [37]郭华桥. 研究型大学智库建设模式与困境突围——基于“学者”使命的视角[J]. *中国高教研究*, 2014(5): 50-57.
- [38]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39]Kwon S W, Rondi E, Levin D Z, et al. Network brokerage: An integrative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0, 46(6): 1092-1120.
- [40]Aral S, Van Alstyne M. The diversity bandwidth trade-off[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1, 117(1): 90-171.
- [41]皮埃尔·布迪厄. 区分: 批判力的社会批判[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42]姚琳, 何伊曼, 邓燕红. 学术型企业家: 美国研究型大学教师学术创业角色冲突与化解[J]. *现代大学教育*, 2023(1): 36-43.
- [43]Singh M, Rizvi F, Shrestha M. Student mobility and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cosmopolitan identities[M]//*Spatial theories of educ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44]Hayter C S, Fischer B, Rasmussen E. Becoming an academic entrepreneur: How scientists develop an entrepreneurial identity[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2, 59(4): 1469-1487.
- [45]邱佛梅, 李洪浩. 有组织创新理论框架下跨境科技创新的制度壁垒与策略研究——以深圳和香港为例[J]. *科技管理研究*, 2025, 45(16): 39-49.
- [46]Achucki M A, Breiger R L. Cultural holes: Beyond relationality in social networks and culture[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0, 36(1): 205-224.
- [47]Carlile P R. Transferring, translating, and transforming: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managing knowledge across boundarie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4, 15(5): 555-568.

【责任编辑 邱佛梅】

From Geographic Space to Innovation Community: Cross-sectoral Explorations of Key-Node University Facult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LIU Xu, XU Ziru & GAO Yuan

Abstrac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serves as a critical strategy for China to promote regional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35 key-node university faculty members in the GB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icro-level practic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key-node scholars in facilitat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mong government, industry,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gional social space. The study highlights tha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s not merely a technical means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but also a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and cognitive reconstruction. Key-node scholars utilize cross-sectoral institutions as a physical “anchor,” enabling the creation,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to occur within the same physical space. Besid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cy discourse and the production of localized knowledge, they contribute to shaping regional identity and innovation communities. Simultaneously, they act as network brokers by flexibly employing strategies such as policy decoding, role switching, and leveraging informal relationships to facilitate resource integration. However, in this process, boundary-crossing faculty also face multiple challenges, including conflicts among the logics of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academia, institutional heterogeneity, and identity dilemmas. The study recommends promoting cross-organizational, cross-institutional,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and collaborative networks to make innovation a deeper leverage point fo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 of space.

Keywords: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key-node university faculty;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production of space; innovation hub